



目 录

1

目 录

绪 论	1
一 春秋时期方术的格局	1
二 史书与方术：卜史同源的传统	6
三 《左传》、《国语》方术研究述评及本书主旨	10
上篇 《左传》、《国语》方术考	
第一章 《左传》、《国语》的星气之占（上）	25
一 岁星之占	28
二 二十八宿之占	36
三 彗星、客星、陨星之占	39
四 日食之占	42
第二章 《左传》、《国语》的星气之占（下）	49
五 望气	49
六 风角、鸟情	52
七 择日术与时日禁忌	56
八 小结	60
附 相术	62
第三章 《左传》、《国语》的龟卜	67
一 《左传》、《国语》龟卜分类	68
二 春秋时期的卜法	83
三 春秋时期的龟卜制度	86
第四章 《左传》、《国语》的筮占	90
一 《左传》、《国语》筮占分类	91
二 春秋时期易筮的特点	102
三 春秋时期的筮占制度	107
第五章 《左传》、《国语》的梦占	110
一 《左传》、《国语》梦占概况	112



二	春秋时期的梦占与其他占卜的关系	121
第六章	《左传》的厌劾祠禳	125
一	《左传》中的怪异妖祥	126
二	祠禳祈祷	128
三	巫的活动	132
第七章	《左传》方技考	136
一	春秋时期的医学理论	136
二	春秋时期的医疗和祷祠禳病	140
三	秦医考	142

下篇 春秋方术概论

第八章	春秋时期各方术门类之间的关系	147
一	从占书体例看各类占卜的关系	149
二	占卜间的匹配并用	151
三	数术与方技的关系	158
第九章	春秋时期方术的演变趋势	162
一	春秋时期方术演变的特点	162
二	卜筮盛衰的趋势	165
三	春秋末期占卜的发展趋势	168
第十章	春秋时期方术对后世的影响	172
一	春秋方术与战国秦汉方术演变之间的关系	172
二	春秋方术对战国秦汉学术的影响	176
第十一章	春秋时期的方术与阴阳五行	182
一	春秋时期阴阳五行说概述	183
二	阴阳五行与数术占卜	187
三	从数术占卜看春秋时期阴阳五行的发展	192
结 语		196
附论	《左传》数术综论	198
一	试论《左传》哀公九年占卜——兼谈五行卜法	198



目 录

3

二 读《左传》的择日术与时日禁忌	206
参考文献	223
后记	230



总 序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是一套学术研究专著。它注重对中国的古代文献(包括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研究和以古代文献为基础对中国文化的探求与思考。其中,有从古文献学的角度进行典籍、文献的专门研究,也有在古代文献、古代典籍研究的基础上,多方位、多视角地审视典籍,审视中国文化,探求典籍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探究它们的结合点。它立足于中国古代的典籍,立足于中国古代的文献,力求体现对古文献研究的特色,倡导一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学风,并且提倡有新的切入点,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推出有质量的,甚至是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是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策划和组织的。作者队伍的主干力量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 25 所大学的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教学、科研机构中的学者和若干家在全国有影响的出版社的专家。同时,也吸收全国各相关学科的学者的符合于这套丛书宗旨的学术研究专著。

这套丛书的书稿将在编委会、学术委员会和出版社分别审定合格之后分批推出。

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联合出版这套丛书。在此谨致真诚的谢意。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3 年 4 月 15 日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重点规划项目**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邓绍基 刘烈茂 许嘉璐 孙钦善
李修生 宗福邦 周勋初 袁世硕 章培恒
黄天骥 黄永年 葛兆光 董治安 曾枣庄
裘锡圭 阚延河

主 编 安平秋

副主编 杨 忠 曹亦冰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 方一新	卢 伟	安平秋	刘玉才	刘晓东
刘韶军	严佐之	李德山	吴景山	* 陈广宏
陈大康	张玉春	张希清	* 张涌泉	张鹤泉
杨 忠	周国林	* 周绚隆	* 姜小青	* 宫晓卫
* 赵生群	赵伯雄	* 赵逵夫	骆瑞鹤	* 高克勤
贾二强	顾永新	* 顾歆艺	黄仕忠	曹亦冰
董洪利	* 韩格平	喻遂生	舒大刚	* 程章灿
戴建国				

(有 * 号者为常务编委)



绪 论

一 春秋时期方术的格局

方术是方技、数术的统称,“方”指方技,“术”指数术。在《汉书·艺文志》六略中,数术、方技略与六艺、诸子、诗赋、兵书诸略并列,为汉以前学术大宗。数术,又称“术数”,《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属于古代天文、历法、占卜之学,是关于宇宙、自然等方面的知识。古人认为,宇宙万物与人事互相影响,观察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即可推知人事吉凶,数术就是古人认为可以沟通“天人之际”的技术。方技,又称作“方伎”,《汉书·艺文志》有《方技略》,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属于古代医药、养生、修炼之学,是古代关于生命的知识。《后汉书》有《方技列传》,其后《新唐书》、《旧唐书》及《明史》亦著有《方技传》。

精通方术的人,可称为“术士”、“方士”。《六韬》称作战时须有术士、方士助阵,“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人心。方士二人主百药,以治金疮,以痊百病”(《六韬·王翼》),这里的“术士”指习于数术,能沟通鬼神的人;“方士”指习于方技,娴于医术的人。这类人还可以合称为“方术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①,这里的“方术士”,即是精通医术、占卜等术的人。

由于古人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局限,方术的内涵相当复杂,既是巫术、迷信的渊藪,也是早期科学知识的源头所在。例如古人仰观天象,观察到恒星位置亘古不变,行星运行有固定周期,因此认为,这种



有规律的现象绝非偶然,而是由一个主宰控制,这个主宰通过天象来显示对人类命运的控制,因此“仰观天文”即可“俯察人事”。这样的观象星占活动需要持久的观测、有规律的记录、复杂的计算,从而推动了天文、历法、算术之学的发展。候风望气之术是以观察气象风云的变化,推算节气更替,预测水旱丰荒,预期人事祸福,所积累的是早期的气象观测知识和物候学知识的一部分。古代医学不发达,沉痾不起、药石无灵的时候,古人往往把死生天寿托付于祝由祈禳等巫术,通过精神状态的改变治疗疾病,在某种程度上起了类似于现代心理治疗的作用。在现代观念中,科学与迷信泾渭分明,水火不容,但在古代社会,科学并非独步而前,而是与迷信相纠结,相依附。方术、巫术同科学的起源难以截然划分,这在世界民族早期发展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这类知识在古代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

方术活动曾渗透到古代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对古代思想史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如在中国古代思想领域影响甚巨、渗透至深的阴阳五行学说,源于古人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哲学探讨,而方术是古人试图沟通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技术,因此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和深化都与方术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方术为切入点,研究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和演进等问题,仍是思想史研究的课题之一。

在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中,战国秦汉时期方术类的简帛佚籍和实物材料日益增多,这些湮没千年、前所未见的实物和佚籍,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学者从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出发,以出土材料结合文献记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开始重新审视古代文化史上一些根本性质的问题,重新评价数术方技之学在古代文化流传中的地位,以及它对中国古代科学、哲学、宗教产生的影响^②,以此重构中国古代知识和思想体系。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③。

对于古代方术,一般的印象是“数术之兴,多在秦汉以后”(《四库全书·子部·数术类》小序)。然而从《汉志》那些分类详细、数量相当多的方术类图书的著录,可以规知,方术在战国秦汉之际已经非常繁复成熟,因此上述估计未免失之过晚。随着近年来战国秦汉时



期方术类简帛佚籍和实物的不断发现,也促使我们考虑方术在战国秦汉之前的实际状况。根据《汉志》的记载及现有的出土发现,我们对方术在战国秦汉之前的情况,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推断。在方术如此繁复成熟之前,必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才达到战国秦汉时期的鼎盛,而不会是从无到有,突如其来地达到高峰。

由甲骨卜辞和先秦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殷商至西周末,已经有了龟卜、筮占和占星、候气、占梦等方术,这一时期可以大致概括为方术的“滥觞期”。春秋时期的方术,继承了殷商至西周的传统,龟卜、易筮得以更广泛的流行,占星、占梦也频繁举行。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占卜方法,如择日占卜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方术仍然在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不断积累,为战国秦汉以后的方术演进奠定了格局,这一阶段可以大致概括为方术的“成熟期”。战国秦汉以降,方术空前发达,这一时期的方术与前期相比,在结构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龟卜日渐衰落,易筮开始兴盛,占星术的地位迅速上升,择日占卜也越来越普及;同时新的方术门类,如式占、堪舆术也开始流行,战国秦汉时期的方术活动异常活跃,大致可以概括为方术的“鼎盛期”。方术发展至此,一些古老的门类衰落,一些新的门类从旧门类中分化或派生出来,但总体来说,方术仍然沿着春秋时期形成的格局,从以往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基础发展而来。可以说,春秋时期是方术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探讨这一时期方术的状况和演变发展,对于廓清先秦方术史的面貌十分必要。

然而春秋时期的方术究竟已经有哪些门类,它们的早期形态如何,各门类之间关系如何,当时对方术有着怎样的信仰,方术对春秋思想的发展产生过什么影响,我们目前的了解还很不充分。只有搞清这方面的基本情况,才能对这一时期方术发展有整体性的把握。

研究殷商至西周时期方术,虽然传世文献的记载相对缺乏,但有甲骨卜辞和数字卦等考古材料可作为依据;战国秦汉时期方术类的简帛佚籍和实物材料更加丰富,以此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使我们的研究视野得以开拓,探讨更加深入和富有成果。但与殷商西周和战国



秦汉时期的方术研究相比,有关春秋时期的考古发现非常贫乏,缺少实物和彝器铭刻材料,是对我们的研究不利的一方面,但有利的因素是,传世典籍中有关这一时期方术活动的记载十分丰富,因此根据传世文献来研究上述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

以有文献可证的周代来说,除《周易》保存了易筮的材料以外,与方术有关的比较详细的记载,主要保存在《左传》、《国语》中(《尚书》、《诗经》和《周礼》、《礼记》、诸子著作中,也有若干宝贵的材料),尤其是《左传》,这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如数术占卜就包括了龟卜、筮占、梦占、星占、相法、择日等术,门类繁多,系统多样化,《汉志·数术略》所列的数术门类,大都能在《左传》中找到实例。这些材料对研究春秋方术的价值自不待言。本书主要以《左传》、《国语》作为研究对象,兼及其他先秦典籍的记载。当然,我们更期待将来会有新的考古发现可与文献记载互证,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提供新的研究线索。

就春秋时期方术的分类来说,《汉志》的《数术略》、《方技略》是重要的参考。这些著录反映了汉以前方术之学的基本分类和大致轮廓,尽管它们代表的是汉人的知识,但仍然可以作为考察春秋时期方术分类和系统结构的重要参考。《隋书·经籍志·子部》有关数术、方技类的著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隋志》以后的史志,因方术之学的不断演变,已经脱离早期的知识背景,不适合用于对春秋时期的材料进行分析,在此不列为参考。下面我们以《汉志》的《数术略》、《方技略》和《隋志·子部》数术、方技类的著录为参考,结合《左传》、《国语》的具体情况,对《左传》、《国语》所见方术的分类进行如下归纳^④：

一、数术类。

《汉志·数术略》分为六类: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隋志·子部》数术类分为天文、历数、五行三类。《汉志》的《兵书略》,以及《隋志·子部》的“兵”类中也包括许多与数术有关的图书。《汉志》的蓍龟、杂占、形法三类,在《隋志》中基本统括在五行类中,



分类趋于笼统,说明当时已经不再沿用汉代数术图书的分类方法。

我们根据数术的性质,把《左传》、《国语》的记载,概括为三类:

- 1、占卜类。
- 2、相术类。
- 3、厌劾祠禳类。

它们的主要内容包括:

1、占卜类。占卜主要与“数”有关,即通过数字的推衍来进行占卜。《左传》、《国语》的数术以各类占卜为中心,记载异常丰富,又可分为:

(1) 星气之占类^⑤。《左传》主要有星占、望气、候风、择日、风角、鸟情等术;《国语》记载比较多的是星占。上述门类,大体相当于《汉志·数术略》和《隋志》的“天文”、“五行”类。

(2) 卜筮类。《左传》、《国语》中关于龟卜、筮占的记载最为丰富。大体相当于《汉志·数术略》的“蓍龟”类,《隋志》的“五行”类。

(3) 梦占类。梦占在《左传》、《国语》中记载也很丰富,它与龟卜、筮占及星占有并用的关系,与厌劾妖祥的关系也很密切,并涉及古代心理治疗理论,也是巫术活动活跃的一个领域。在《汉志·数术略》中属于“杂占”类,在《隋志》中属于“五行”类。

2、相术类。相术主要与“象”有关,即通过观察事物的表象进行占卜。《汉志·数术略》称为“形法”,《隋志》收入“五行”类。《左传》中属于相术的主要是相面和相手纹,《国语》中的记载相对缺乏。占星除了推衍数字外,也要观察天象,因此这种占法和“象”、“数”都有关系,我们根据这一点,把《左传》相术类材料编为一节,附于星占后。

3、厌劾祠禳类。厌劾祠禳的“厌劾”是指“厌劾妖祥”,即镇压驱除鬼怪不祥,又与方技类的祝由术有关;“祠禳”是指“祷祠祈禳”,“祷祠”是告求神祖降福,“祈禳”是驱除邪恶之祭,二者都与人的心理活动有关,在古代也被用来治疗疾病。厌劾祠禳术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左传》有大量此类记载。厌劾祠禳在《汉志·数术略》中附于“杂占”类,《隋志》此类图书著录极少,可见其在后世的衰落。



二、方技类。

《汉志·方技略》分为四类：医经、经方、房中、神仙。《隋志·子部》以“医方”概括。《左传》、《国语》有关方技的记载远较数术为少，但有很多占卜疾病和禱祠禳病的记载，《国语》这一类的记载比较少。这一方面恐怕是因为史官的职事不包括医事，记录较少；另一方面也与先秦时期医疗水平低下，人们患病时常常靠求巫问卜，禱祠禳病有关。

《左传》的有关内容主要包括：

1、古代医学、心理学理论。这一时期的医学、心理学理论处于萌芽阶段，但已经开始强调以术论道，以医理知治国之理，这一理论对后世医理重道轻术的传统有很大影响。

2、驱邪禳病。《左传》主要包括以祝禱诅咒禳病的祝由术，类似后代心理治疗，起到一定的调整精神状态的作用，并与数术类中的祠禳的性质有相通之处，但祝由术则更侧重于驱邪禳病，通过精神状态的改变，达到治疗的作用。

二 史书与方术：卜史同源的传统

《左传》、《国语》作为史书，保存了大量的与方术有关的记载，尤其是《左传》记载的数术占卜，几可以百十计，约占全书篇幅的十分之一。这些占卜预言前呼后应，几乎言必有中，语无虚发。前人曾批评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晋范宁《春秋谷梁传序》）言其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因而失之诬枉，不可尽信。清代学者汪中总结《左传》之所“失”云：“《左氏》所书不专人事，其别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筮，曰梦。其失之也巫，斯之谓与？”^⑥近人更谓《左传》好言卜筮神鬼，无非迷信荒唐，不必求之过深，因而对这些记事采取视而不见或有意规避的态度。但是，为什么早期史书会有这一类的记事？为什么后来的正统史书中还有《天文志》、《五行志》等体裁专讲天道星命、祸福灾异？就拿《左传》来说，从军戎祭祀、承嗣即位的庄严大典，到婚丧嫁娶、却病除疾的日常琐事，上至周



王诸侯,下至士庶民人,无不推崇占星望气,灼龟揲策,禱祠祈禳,用来频求神意,占卜在当时社会的功能和作用,远非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它在古代社会有着丰富的内涵,涉及宗教、哲学、科学等领域,与人们的信仰息息相关。

《左传》、《国语》是在史书中写占卜,史实与占卜相互贯穿,这些数量可观的记事,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真实的记录,但早期史书之所以有这种现象,其主要原因恐怕还与史官秉承自上古以来的“卜史同源”史学传统有关。上古天人不分,政治上称天而治,学术上也是天人并称,最初掌天人之事的是史官,其职事极为广泛,除典掌宗庙祭祀、排列世系、管理图籍、编著史册等人事外,也掌管天文历法、占卜星算、祈禱祠禳等通天之事,兼通天人本是史官的基本修养。其记录史事的范围也随之涉及天人之间一切事物。

《左传》、《国语》中的史龟、史朝、史赵、史墨、内史过、内史叔兴、史华龙、周太史正是这样一些兼掌天人的史官,他们身为史官,同时精通星占、龟卜、筮占、望气、相面等术,是春秋时期非常有名的数术家。汪中在《述学·左氏春秋释疑》中提到这些史官时说:

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得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然则史固司天矣。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过请以其物享焉。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二人曰:“我太史也,实掌其祭。”然则史固司鬼神矣。陨石于宋五,六□退飞过宋都,襄公问吉凶于周内史叔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大史,然则史固司灾祥矣。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然则史固司卜筮矣。

他总结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此史之职也。”^①可见数术占卜本由史官来承担,因此《汉志·数术略》小序说:“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天人不分的传统集中地体现在史官身上。贯通古今,预知未来,探索天人之际一切事物及其规



律,始终是史官的职责。

史官既负责国家祭祀宗庙、礼仪名号,又是一切文化知识的掌握者,因而在早期有很高的地位,而且时代愈古则史官之位愈尊:

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⑧

史官受到尊崇,与他们的职守有关,“盖古代之尊史官,非尊其官也,尊学术耳。古代学术以天文术数为大宗,而天文术数亦掌于史官,此史职所由尊也。”^⑨在《周礼》的春官系统中,负责天文历法的保章氏和冯相氏,就隶属于太史。直到汉代,史官还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司马迁追述其父司马谈向之所学:“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论道于黄子”(《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代史官“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史通·史官建制》),那时史官的地位虽然已经大大下降,如司马迁所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而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但他仍然自信自己的能力在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昭示古今天事人事的理数和命运。虽然汉代史官的职权逐渐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其原因仍然是“尊天之道也”^⑩。

史官除好讲天道以外,对天变灾异的现象也很关注。早期史书从《春秋》开始就重视记载各种灾异,认为灾异与政治形势和人类命运密切相关。《史记·天官书》说:“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这种观念也是从天人不分的传统而来。《春秋》把陨星、日食、地震、雷电、火灾、虫灾,甚至鼯鼠食牛等灾异,与人世治乱联系在一起,目的是“重天变以警人君”。《左传》继承《春秋》传统,重视灾异天变的启示,以天道比附人事,主张法天立道,对汉以来盛行的天人感应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春秋》、《左传》之记天变灾异,对后代正史的观念也有很大影响。汉以后史官职务范围缩小,其记载亦大部分限于人事,但汉以后的史书仍然常常讲天变灾祥征兆,这应当是早期传统的余绪。《史



记》有《天官书》，《汉书》有《天文志》、《五行志》。以后的正史，大都有天文、五行、灾异诸志。刘知几主张删除史志中的天文志，理由是：“古之天犹今之天，今之天即古之天。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史通·书志》）他主张，如果作天文志，也只应记载当代的日食、月食和星位移动等。刘知几身处唐代，当时史官以著述为宗，不掌天官，自然不以记天象变异为务。

以上是从史官的职守来看史书与方术的关系，从史书的体裁来看，我国最早的史书《春秋》是“以天时记人事”的编年体史书。《汉书·律历志》说：“自殷周皆创业改制，咸正历纪，服色从之，顺其时气，以应天道。夫历《春秋》者，列人事而因以天时”，即认为《春秋》也有以服色、时气应天道的数术含义。《春秋》以历法为纲目，是为了“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以考察寒暑杀生之实”（《汉书·数术略》“历谱类”小序）。《左传》继承了《春秋》的体例，其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异同”（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即从时间顺序和事件因果上来安排史料。它的记事特点是以历法为纲目，既载天象，又列史事，并杂以占卜预言。

由上所述，研究先秦史书的这一类记事不单是古代史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对研究早期史书结构、史书体例，以及史学传统、史学观念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左传》一部分数术占卜材料的可信性曾经受到怀疑，《四库全书总目·春秋左传正义》说：“《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征验，盖不免从后传合之。”有很多学者对这类材料做过辨析，并指出，这些材料有的涉及到战国时期的史实^①。特别是有一部分星占的材料，据现代学者研究，是战国时期才写入《左传》的^②。如何看待这些材料，胡念贻先生在《〈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中有很好的分析：

春秋时代，确实有许多占卜家之类对一些个人或国家的吉凶祸福作过许多预言。他们的预言当然有许多不应，但不可否认也有一部分应了。其所以应，是由于占卜家之类发出预言时，对某一个人或国家有所了解，经过研究作出大概的估计，并且含糊其



词,他们所说的和后来事实的发展似乎大体符合,就算是“验”了。有时即使没有什么根据,也有偶然说中的情形。……但是,《左传》里的这些记述,也许还是有传说根据,不完全是作者个人虚造。当时人们普遍相信这些东西,一定有许多关于这些东西的传闻和记载。《左传》的作者得到那些传闻和记载,而且看到了那些历史事实的结果,可以根据结果来把预言加以修订,写得更加神乎其神。^⑬

由此可见,某些记事可能是战国时人所悬拟,但仍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知识和思想观念,我们既应该慎重对待,也应该做具体的分析。《左传》这方面的记事又比较隐晦深奥,还需要我们探赜钩沉、索隐发微,更准确地理解材料。

三 《左传》、《国语》方术研究述评及本书主旨

一、《左传》、《国语》方术研究历史。

以往,学者曾对《左传》、《国语》方术某些方面的问题作过专深的研究,但多侧重于从经学、礼学和宗教研究等方面进行探讨,如从经学史的角度研究《左传》的易筮,因为这些筮例是关于《周易》早期流传的记录 或把《左传》记载的方术礼仪与《周礼》等礼书的有关记载进行对比,考察先秦礼制 或从宗教史的研究出发,研究占卜、巫术与宗教的关系 或从科技史的角度出发,讨论占星记录对于天文学史研究的意义。这些研究取得了许多成绩。

以往的研究总体来说有以下几类:

1、各门类方术的综合性研究。

容肇祖先生 1928 年撰写的《占卜的源流》^⑭,是较早的综合性研究文章,该文对殷代至宋明以来的龟卜、筮占、星占等占卜术的起源、发展做了概括总结,并把春秋时代作为方术史的重要发展阶段之一来讨论。但是文章对占卜类别的总结还不够充分,比如对春秋时期的占卜,仅限于对星占、龟卜、筮占讨论,对其他重要类别,如梦占等均未涉及。因为讨论的范围有限,有些看法又受到当时古史辨派辨



伪观的影响,结论难免带有局限性,比如作者断定现存的《连山》、《归藏》是依附于《周易》而伪造;又以《隋志》以来的著录为依据,认为六壬、遁甲等术在六朝至唐代才开始通行。因此,我们还应该在这个讨论的基础上,对春秋占卜做进一步的梳理工作。

对于数术占卜各门类之间的关系问题,李镜池先生在《周易探源》的系列研究中,专门讨论了与《左传》有关的数术占卜之间并用的问题^⑮。《〈周易〉筮辞续考》一文,援引《左传》占卜之例,对春秋时期各数术门类间的并用和互参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春秋时代往往以易筮、龟卜、星占等术参用来考定吉凶,特别是卜、筮相袭的现象最常见。又指出《周易》的筮辞里,有用杂占(即《汉书·艺文志》数术略的“杂占”类的占梦等术)与蓍筮参用的记录,说明当时占卜使用“双重验证”的方法。虽然文章所列举的某些例证是否属于“双重验证”还值得进一步讨论,但文章对春秋时期占卜并用现象的分析,对研究这一时期数术占卜的特点很有启发。

2、对星占的研究。

《左传》、《国语》所记载的占星家观察的星象主要包括岁星、二十八宿、彗星、陨星和日食。前人对《左传》、《国语》天文星占的研究大都从天文学史的角度出发,把《左传》和《国语》的占星记录作为研究古代天文学的材料,运用现代天文学知识,印证古书记载的可靠性,推导星辰运行轨迹,日食隐现等规律。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朱文鑫《天文考古录·春秋日食考》^⑯,陈尊妨《中国天文学史》^⑰,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的有关章节^⑱。

另一项重要的研究,是利用《左传》的占星记事讨论《左传》成书年代,其中以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最具代表性^⑲,新城氏在《由岁星之纪事论左传之著作年代及干支纪年法之发达》及《再论左传之著作年代》两篇文章里,对《左传》有关岁星活动的记录进行逐一分析,由岁星超辰规律推断《左传》成书年代当在战国中晚期。新城氏的某些看法虽然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提供了《左传》年代学研究的新线索,因此文章一经发表,便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



王梦鸥先生曾著《阴阳五行家与星历及占筮》一文^{②①}，对《左传》的星占进行了较好总结，认为《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末期的五大行星的占验，依据实际天象的多，没有一定的原则可言，五行相胜、相生也没有必然的规律。但对材料的分析尚有疏漏，如作者认为《左传》记录针对了五大行星的占卜活动，但《左传》于五大行星中，实际上只出现了岁星（即木星），并未涉及五大行星中的其他行星，由此，文章对春秋时期星占与五行说的关系问题所做的结论，也有尚可商榷之处。

日本学者□出雅著《左传の占星记事について》^{②②}，总结了《左传》占星所依据的各种理论，认为《左传》的占星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但这些记载都经过了刘歆及刘歆之后史官的加笔和修改。刘歆作伪说早已被证实为不可靠，我们还应该就实而论，认真地分析每一条记录。

在上述研究中，从数术角度研究《左传》、《国语》的星占在占卜体系中的结构性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少。

3、对筮占的研究。

前人很重视《左传》、《国语》筮法的研究，这方面的论著很多，这里只撮其要略，作简要的介绍。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把《左传》的筮占抄撮在一起，即西晋时在汲县魏襄王墓出土的《师春》一书。《晋书·束皙传》说：“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新唐书·刘昫传》说《师春》“录卜筮事与《左氏》合，知按《春秋》经传而为也”，说明战国时人对《左传》中所见的筮占就已经很重视。朱熹《易学启蒙》依据《左》、《国》筮例，总结出七条占卜体例。但考之《左传》、《国语》，朱熹的归纳并不完全符合春秋时筮占的实际情况。

清代学者毛奇龄从《左传》、《国语》中辑出易筮筮例，编为《春秋占筮书》^{②③}，自序称：“及书成而《易》义明，即占《易》之法亦与之俱明，觉向时读诸传而茫然者，而今豁然，向之释其词、核其事，以为必不能有是而闷然者，而今则实见其有是，而邈然，快快然。此非三古以来数千年不传之秘，至今而始发之乎？”毛氏认为《左》、《国》筮例难明，然而其读解又很重要，因此对它们进行重新梳理，毛氏对筮例